

2. Christiansen, M. H. and S. Kirby, eds. 2003. *Language 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Gong, T. and Wang, W. S-Y. 2005. Computational modeling on language emergence: A coevolution model of lexicon, syntax and social structur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 1: 1- 41.
4. Ke, J., Minett, J. W., Au, G-P. and Wang, W. S-Y. 2002. Self-organization and selection in the emergence of vocabulary. *Complexity* 7. 3: 41- 54.
5. Ke, J. Y., Ogura, M., and Wang, W. S-Y. 2003. Optimization models of sound systems using genetic algorithms.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9. 1: 1- 18.
6. Minett, J. W. and Wang, W. S-Y., eds. 2005. *Language Acquisition, Change and Emergence: Essays in Evolutionary Linguistics*.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7. Tomasello, M. and M. Carpenter. 2005.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Cognition in Three Young Chimpanzees*.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Serial No. 279.

文白异读、音韵层次与历史语言学

王洪君

(北京大学 中文系,教授)

历史语言学中,“层次”指一个语言(或方言,下同)中成系统地存在外语的成分,外来层次是语言接触的产物。

19 世纪的历史比较法建立了一整套重建一个语言语音系统自身演变而分化的程序,并提出在运用历史比较法的各步程序之前,必须先“剔除借用”(也即剔除外来层次)和“剔除语法层面类推”。20 世纪的内部拟测法则在如何鉴别语法层类推(特别是词法)对音变的影响方面,给出了具体的词形归一程序。

汉语方言的字音多有文白异读,其文读音大多反映了历代权威方言对地方方言的影响,属于“外来层次”。需要认真考虑的是,文白异读所反映的“层次”,与印欧语中历史比较法所剔除的“借用层次”相比是否有自己的特点;从历时的角度运用文白异读的材料来重建汉语音韵史,历史语言学现有方法是否足够,是否还需要一些补充。此外,如何鉴别与外来层次有关的文白异读、扩散式音变导致的异读、过气词法造成的异读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1. 汉语文读所反映的“外来层次”也需要重建

欧洲语言中的“外来层次”,其外部影响源是已分裂为不同国家、使用不同文字的另一语言(尽管它们也大多有同源关系)。这种影响大多是短时期,文献有明确记载的。特别是,欧洲文字是表音的,各大支语言有较丰富表音文字的文献,从而原始语分化成哪些后代语,各级分化(特别是中古以来)有什么样的创新变化,在地理上的分布如何,表音文献大多可以提供较确切的证据,无须依赖另一语言的外来借用层来拟测,如中古罗曼语无须借助英语中的罗曼语借词层重建。

汉语的情况有所不同。汉语(含各个方言)的历史变化,由于社会形态、语言、文字性质的独特性,不同历史时期权威通语对地方方言的影响与方言自身的演变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文白异读就是这种复杂交织的直接体现。汉语方言文读的“外来源头”,一般是历代权威通语或高阶层移民的方言,它们与地方方言是已分化的同源方言的关系。在政治文化上同属一个中央政权统治、同用一套书面语音标准使得权威方言对地方方言的影响长期而持续。而同用一套不直接表音的汉字,又使得历代方言和历代通语的语音系统都没有直接表音的文献。这样,汉语在各个时期分为哪些大方言,它们有哪些独特的创新并形成什么样的对应规则,历代通语的基础方言在哪里;在文献上保留的证据不多,直接表音的证据更

少。方言中不同层次的文白异读就成为厘清这些问题的弥足珍贵的资料。也就是说,对于汉语来说,既需要通过白读音来重建各地方言早期的共同创新(特有的音类分合关系)及其地理分布,也需要通过文读音来窥视各个时期的权威方言及其地理分布。只有充分利用文白异读的材料才能尽可能地逼近汉语历史上“演变分化与接触趋同”这纵横两向立体式变化的原貌。

2. 汉语文白异读反映的是音韵层次

通过对山西闻喜、祁县方言的社团变异的调查,我们发现汉语文白异读所反映的“层次”与印欧语中的“外来层次”有所不同,前者的性质是“音韵层次”,而后者是词汇层次。音韵层次与词汇层次的差别在于,音韵层次的基本单位是小于语素音形的语音单位,而词汇层次的基本单位则是词或语素。

印欧语言之间彼此的接触借用,也有不同来源的成分彼此杂配的现象,但根据已有的研究,除重音模式外,它们的杂配只是不同来源的词根与词缀之间的杂配,词根内部更小语音成分的杂配(如词根中元音是本地的,词首辅音是外来的)还未见报道。因此,印欧学者可以根据根词元音或辅音中某一项的对应,来判定整个词根是否属于外来层次,是否应该剔除。

汉语方言的文白异读则小于词根音形的声韵文白杂配相当常见。比如山西闻喜郊县方言中“明”的语音形式有4个: ϵmi (声文韵文), ϵmi (声文韵白), ϵli (声白韵文), ϵli (声白韵白), 中间两种形式属文白杂配。在这四种形式中, $m \sim l$ 的交替是闻喜一个县特有的,但仍出现了 ϵli 这一其他方言从未有过、但白读声母与文读韵母杂配的形式。我们在闻喜调查时还发现,中青年人群的单字音中,文读声母、文读声调对白读声母、白读声调的替换并不是连锁的,中青年人群新出现的字音中不乏“声文调白”或“声白调文”杂配的实例(徐通锵、王洪君,1986;王洪君1992)。当然,由于文白读在语用色彩上的差异,文白杂配的比例要小于文配文或白配白。实际观察到的、进行中音变中出现的文白杂配实例,鲜活地表明了汉语方言中文白异读的竞争替代是以小于词根音形的语音单位——声母、韵母、声调为单位的。类似的现象王士元、连金发也多有发现并从理论上总结为“双向扩散”。

总之,我们认为,汉语的文白异读虽然与词汇层次有密切的关系,但从根本性质来看,是属于音韵层次的。

3. 文白杂配、音韵层次的离析、原始音类的拟测

历史比较法重建原始音类的原则是,后代语在相同语音条件下对立分布的最小对应组一定是原始语中对立音类的遗留。这一原则必须保证所比较的材料是同一层次的,如果不同层次的字音放在一起拟测原始语,所拟测的原始音类就会多于历史事实。

文白杂配给历史比较法“剔除借用”这一步骤带来的问题是,既不能根据是否早期日常生活词汇、是否当地口语特有词汇来离析层次,也不能根据字音中某一语音项来确定其他语音项的层次。这使得汉语离析层次的程序必须与印欧语剔除外来层次的程序有所不同。汉语方言必须以声韵调为单位离析音韵层次,这一点在国内汉语学界可以说已经达到共识。

此外,文白异读只在部分音类的部分字音中出现,也即仅从当前状况看,文读或白读都不构成一个完整的字音系统。但地方音系在接受外来影响之前一定是有个完整字音的系统,而外来权威方言音系就其自身而言也是有个完整字音的系统。只有根据部分音类部分字音中遗留的文白异读重建出完整字音的系统,才能确定汉语各个时期各方言的特点及地理分布上的消长。历史比较法仅用“剔除借用”来区分层次则明显无力应对这样的任务。下面简单介绍笔者在汉语方言研究中所用的“析层拟测法”(王洪君,2006)。

析层拟测分为三大五小步骤,与历史比较法不同的程序只在第一大步骤“离析并重建单点方言的层次”。它分为两个小步骤:(1)确定“有(文白)异读音类”的古音条件和有异读音类所有字音的文白层次;(2)整合有异读和无异读音类配整各层音系。

(1)确定“有异读音类”及其古音条件,也就是要找出本地音系与外源音系这两个姊妹方言因各自创

新而造成的音类分合关系的不同。两方言的分化可能在上古、中古、近古等不同时期,因此我们采用与历代通语的音类分合关系进行对比来确定不同方言中有异读音类的古音条件。如闽语止开三支韵字主元音为 a 韵的白读音基本都在上古歌开三而不在上古支开三;绍兴话鱼韵字主元音为不圆唇元音(i)/ e)的白读音只限于中古的鱼韵而无一在虞韵;山西闻喜方言有 ɛ 韵的白读音只限于宋代的梗摄(但中古的二等或三等重韵耕庚清中都有分布)而无一在曾摄;从白读音只落在某一时期的某一音类之中,可以确定这些白读与相应文读音系分歧演变的音类条件。

以下两点在国内汉语学界已成共识: a. 根据部分字音的异读离析出来的层次适用于整个“有异读音类”所有的字,也即有异读音类中只有一读的字要比照与有异读字的对应关系而归入相应的层次。 b. 文白音韵层次不是以词汇判定,而是以字音声韵调的对应判定。

(2) 整合有异读音类和无异读音类,配整各层音系。这一步骤的主要精神是强调音类分合关系对于判定层次、配整层次的重要性。一个方言的文白异读只出现在部分古音类中,其他的古音类则整类没有文白异读出现,笔者称之为“无异读音类”。无异读音类是配整各层完整音系的关键。从历时的角度看,“无异读音类”是本地音系和外来音系音类分合关系相同且音值大致匹配的部分,也即无异读音类在文读传入之前就在本地存在,在文读替换白读后也依然在本地存在。所以在析层拟测中,无异读音类既应该算白读层,也应该算文读层,一身二用:无异读音类加上白读音类,一套白读音音完整了,本地方言创新或守旧的音类分合关系也显出来了;无异读音类加上文读音类,另一套文读音音也完整了,外地权威特殊的音类分合关系也显示出来了。

分层重建的公式可归纳为如下,请注意其中的“音类”均指“语音形式及其所辖字”。

有异读白读音类 + (有同音关系的) 无异读音类 = 白读层音类

有异读文读音类 + (有同音关系的) 无异读音类 = 文读层音类

以上两个小步骤离析出一个方言中叠置的不同层次的音类分合关系(不仅可以两层也可以三层或四层)。不仅观察某个古音类在不同层次上的不同音值,而且观察它在不同层次上与无异读音的音类交流关系,是我们工作程序的最大特点。

我们希望以上工作程序能对历史比较法有所补充,但目前来看它们还不够成熟。比如:如果一个语言没有《诗经》《切韵》等早期的历史文献,如何确定“有异读音类”的辖字范围?按声韵调和不同古音条件分别离析出几个层次后,如何判断哪几项在同一层次上?等等。其他学者处理层次使用的另外一些方法也很值得注意。比如,丁邦新先生(2002)是分别各项文白异读确定每种异读形式的源头及其相对年代,并不配整白读或文读音系;陈忠敏提出必须根据一片地域多点方言的文白异读来确定某个点方言各项异读的层次关系。此外,换用扩散波模型来观察汉语方言的层次也许会有新的突破。

以上三节说明,汉语方言文白异读的材料的确为历史语言学提出了一些有待解决的新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4. 文白异读、音韵层次与扩散式音变

汉语方言中的一些异读,表面看很像是方言接触带来的文白异读(也即前面说的音韵层次),实际上却是词汇扩散式音变(Wang, 1969)的结果。

扩散式音变给历史比较法拟测原始语音类和离析层次的程序提出了新的问题。

(1) 扩散式音变可以造成原始语音类在后代语中无语音条件的分化,就这一点看,与接触造成的层次叠置的结果相同,而与历史比较法的理论预设(“语音只依据语音的条件而分化”“同一语音条件的词要变一起变”)不同。如果把扩散式音变两个阶段的语音形式放在一起施用历史比较法的程序,与把本地层形式和外来层形式放在一起的后果相同——所拟测的原始语的音类将多于历史事实。比如,现代

北方话中“他大”(a 韵)和“拖舵”(uo 韵)同为舌尖声母而韵母不同,根据历史比较法它们在中古将被拟测为不同的韵类,但中古韵书和诗歌押韵的历史文献都证明它们原来同是歌韵字。

(2) 扩散式音变是自源性的演变,这一点又与外来层次有本质性的区别:因扩散式音变无条件分化而共存的新旧形式只对本地音系的历史重建有价值;而外来层次的形式在历史重建中却主要是对外方言音系的历史重建有价值。是扩散式音变还是接触带来的音韵层次,所重建的历史进程是完全不同的。

国内学者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了以上两点。王福堂(2003)用“同源层次”和“异源层次”来区分两者;潘悟云(2004)则用“音变滞后层次”和“外来借用层次”来区分。王洪君则主张还是沿用历史语言学原来的术语定义,“层次”限指“外来层次”,但在自源性演变中进一步区分有条件音变和扩散式音变。

名称的差异并不是重要的,上述学者都从术语上严格区分了外来的音韵层次、扩散式音变与新语法学派有条件音变。下一步的任务是如何区分扩散式音变的前后阶段与文白异读的本地外来层次,如前所述,这对于正确地重建汉语方言演化的整体图景是至关重要的。

在如何判别扩散式音变与外来音韵层次方面,我所了解的探讨有如下这些:

(1) 潘悟云(2004)强调普遍音理的判别作用。以潘所分析的吴语歌韵为例:上海话的歌韵字大多是 u 韵,但有个别口语常用字的口语音是 a 韵(“破”、“拖~鼻涕”);潘判这一演变属于扩散式音变。理由之一是异读的两种形式能够排到符合音理的一条演变链 $a > \text{ } > \text{ } > o > u$ 之中,这无疑是判定为单系统内某个音类自身发生音值漂移的必要条件。理由之二是外来层次的假设从音理上不通。根据扩散式音变的假设,吴语歌韵自身发生了元音分阶段高化的进程,而根据外来层次的假设,则吴语早期没有元音高化以致需要引进北方的歌韵 o,但引进 o 之后却突然转向急速高化。比较两者,无疑前一种假设更加符合普遍音理。

音变应该符合普遍音理,是历史比较法十分重视的观念,但由于汉字不表音,音理在汉语史的研究中常常被忽视。仔细梳理汉语方言的各项主要音变,总结汉语中最常见语音变化的普遍音理,并以此判定一些异读是扩散式音变还是本地外地系统的叠置,无疑很有价值。

(2) 王洪君(2006)强调风格色彩、音类匹配关系的判别作用。属于音类合流的音变很难排得出一个连续的音变链,如吴语绍兴方言中曾经发生的蟹摄开口一等 韵(ε 韵)并入同摄二等(a 韵)的音变。王根据¹ 这些 ε -a 异读没有明显的文白风格差异,④新读 a 韵匹配到现代权威方言(北方话)是麻韵 a 字而不是蟹摄一二等合流的 ai 韵字,④吴语的其他一二等韵普遍有一等并入二等的音变;判定新读 a 不是从北方方言借来的,而是本地方言自生的。

音值及演变音理、音类分合或匹配关系、风格色彩和各大方言的现状和历史记录,对于判别外来层次或扩散式音变而言,都是需要利用的。

明确了外来层次与扩散式音变的性质,我们至少可以做到:(1)对于有文献记载的古音类在方言中无条件地分化为两类或多类的情况,特别是如果只有不足 5% 的个例,千万不要轻率地上推为原始语音类的遗留;(2)判定为外来音韵层次,除了风格色彩外,其外来影响源还应该有关音类分合关系方面的证据;(3)判定为扩散式音变的中断(新形式占 20%~80%),最好能找到干扰它未能完成的另一音变。如绍兴方言蟹摄一等 韵 $\varepsilon > a$ 扩散式音变的中断,是由于该方言蟹摄开口二等出现了相反方向的 $a > \varepsilon$ 的文白替代音变。对于扩散式音变基本完成遗留下来的滞古形式(少于 5%),则不需要找到另一干扰音变。

无可否认,我们仍然会无力判定一些年代久远的音变究竟是扩散式的还是外来式的。如果没有证据,就不应该硬加辨别。

5. 文白异读、音韵层次与词法遗留现象

汉语方言中还有一些看上去很像文白异读的一字两读,其实是已过气的语音词法规则的遗留,与外来音韵层次没有任何关系。准确地鉴别这些成分,是离析层次并施用历史比较法的前提。内部拟测法

为鉴别词法语音规则提供了很好的工作程序。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汉语的词根(单字)具有“一音节一义”的特点,其过气语音词法的残留可总结为少数常见的类型。

这一方面最早的成功范例当属徐通锵的《宁波方言的“鸭”[ɛ]类词和儿化的遗迹》(虽然作者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运用了内部拟测法)。徐判定宁波方言的“鸭”类词的[ɛ]类异读并不是本地白读,而是儿化合音词法规则的遗留,主要基于如下理由:(1)不同的古音类,无论来源于阴声韵、阳声韵还是入声韵,它们的[ɛ]类异读都只相当于中古阳声韵在当地的反映形式,也即都可以用曾经后加鼻尾来解释;(2)该类异读基本都只用在指称名物时的后字位置并且有若隐若现的小称义。(1)(2)两个特点与语言接触引发的文白异读完全不同。综合语音、语义和语法出现位置的限制,徐提出,这些被专家和当地人都看作白读音的形式,其实是单字词根与后加-n的合音形式;而这个-n是高于语音层面的、有名物化和小称作用的语法成分“-儿”(根据方言对比可知它的语音原型是[ɲ])。这篇文章以强有力的证据鉴别出宁波方言中过气语音词法的遗留,指出它对语音音变的干扰,结论得到学界一致的肯定。

这个例子在汉语中有普遍价值。汉语的词根有“一音节一义”强势关联,词法层面后缀弱化而造成的“词根+词缀”的合音形式最容易被误判为接触层次中的白读。

内部拟测法就是要像徐所做的那样仔细地分析各种异读形式的语音交替规则和语法功能,如果异读形式有统一的音值走向且有固定的语法功能,就说明这是历史上后加词缀引发的词法音变(与欧洲的umlaut类似)的遗留,就需要根据汉语音节弱化合音的规律来重建原来的词根、后缀和词法音变规则,这之后才能对经过重建而归一的词根、词缀、词法音变规则分别进行一片地域多点方言的历史比较。如果不能正确鉴别词法对语音的影响,预先归一词形,会给方言层次的离析和原始语的重建带来致命的错误。

综合以上五点,语言的历史变化是多种不同性质的音变同时行进的立体化进程:有单系统自发的新语法学派式规则音变、扩散式音变,有不同系统接触引发的层次叠置式音变,也有词法引发的音变;它们的音变方式各不相同,对音系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历史语言学一直在丰富、完善自己的理论方法,以区分不同性质的音变、更准确地重建语言立体演化的复杂图景。汉语文白异读是语言史研究尚未充分利用资料,我们感到,历史语言学已有的理论方法,对于重建汉语音韵历史变化的复杂图景同样有普遍价值,但在如何离析外来层次、确定扩散式音变等方面还需要根据汉语文白异读材料的特点有所补充。

参考文献:

1. 徐通锵、王洪君:《说变异》,《语言研究》,1986年,第1期,第42-63页。
2. 王洪君:《文白异读与叠置式音变》,《语言学论丛》:第17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22-154页。
3. 王洪君:《层次与演变阶段——苏州话文白异读析层拟测三例》,《语言暨语言学》,2006年,第7卷,第1期,第63-86页。
4. 一邦新:《〈苏州同音常用字汇〉之文白异读》,《中国语文》,2002年,第5期,第423-430页。
5. Wang, William S-Y. Competing Change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1969, 45: 9-25.
6. 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中的层次》,《语言学论丛》:第27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0页。
7. 潘悟云:《汉语方言的历史层次及其类型》,《乐在其中:王士元先生一十华诞庆祝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9-67页。